

抗日战争史丛书 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
荣获第二届全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外交系列

没有硝烟的战线

——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

王 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外交系列

没有硝烟的战线

——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

王 真 著

责任编辑:江 淳 何林夏

封面设计:林胜利 赵子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7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7—5633—2107—1/K·060

定价:平装:14.75 元

精装:20.25 元

《抗日战争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桢林

副主编 江 淳 侯样祥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则勤	门立军	王桢林	江 淳
刘建业	乔还田	李良志	杨圣清
武月星	林治波	侯样祥	郭德宏
解学诗			

《抗日战争史》丛书

总 序

和洪志

在本丛书编委会的同志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广大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抗日战争史》丛书陆续出版问世了。这是我国学术界、出版界为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实事求是地向广大读者展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之全貌,以实际史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做出的有益尝试,是很有意义的。对此,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抗日烽火的老战士表示衷心的祝贺。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的100多年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胜利史。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受尽侵略、凌辱、欺压,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样,正是在这受尽侵略、凌辱、欺压的100多年里,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阶级压迫,曾进行了可歌可泣和波澜壮阔的斗争。但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前的所有斗争,并没能使中国人民摆脱被侵略、被掠夺、被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地位,只有到了抗日民

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才由失败转向胜利。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顽强斗争，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彻底打败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惊天动地的伟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

中华民族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伟大胜利，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消灭、抗击、牵制了大量日军。这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的彻底失败作出了伟大贡献，而且也有力地支援了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减轻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为早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整个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牺牲之重、作用之巨，是举世瞩目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为了使广大青少年和后来人更加了解这段历史，编辑出版一套全面反映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浴血奋战、英勇牺牲，为国家、为民族、为世界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的历史的丛书，对增强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精神，对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对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大有裨益。

这套丛书不仅以大量篇幅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所取得的卓越成

就,而且对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官兵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和论述;不仅直接阐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而且对海外华侨、国际爱好和平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与贡献也作了叙述;不仅对社会上层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作了如实阐述,而且还把视线瞄准了广大基层人民;不仅重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而且还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等也作了介绍,力图使读者能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地来了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全貌。无疑,这对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促进学术发展和繁荣是很有作用的。

1992年6月

编辑说明

抗日战争是近代 100 余年来中华民族首次打败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侨胞团结奋斗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热情支持下取得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最前线浴血奋战,英勇牺牲,为国家、为民族,也为世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了全面反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之概貌,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进步与繁荣,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编辑了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是一套学术丛书,丛书规模在 50 种左右。选题范围,时间上始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迄于 1945 年 9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内容上包括“政治系列”、“经济系列”、“军事系列”、“外交系列”、“文化系列”、“人物系列”及“综合系列”等。从 1992 年开始陆续出版,到 1995 年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全部出齐。

本丛书的编辑方针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贯彻忠于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为研究对象。既要反映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又要反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相互关系;既要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抗战取得胜利的卓越贡献,又要反映国民党中央统帅部和广大爱国官兵对抗战的贡献;既要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状况,又要充分展示此一时期中国的社会、

学术、思想、文化情况；既要反映当时决策层的情况，又要反映广大基层人民的情况，等等。总之，我们试图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地来考察抗日战争，将抗日战争的全貌展示在广大读者面前。

本丛书在编纂体例上，既照顾丛书的完整性，又兼顾各专题的相对独立性，尽量做到点面结合。在学术观点上，尽量照顾、尊重各作者个人的观点，不做统一要求，只要论从史出、逻辑严密、自圆其说、利于学术之发展与繁荣、符合本丛书的主旨，我们即予承认。

本丛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关照。德高望重、身经抗日烽火的杨得志将军为本丛书作了序，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专家学者等都关心着本丛书的问世，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样，才使本丛书在政治上、学术上更加全面、完善、健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丛书的出版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抗日战争史》丛书编委会

1992年6月

绪 言

外交,通常是指用智谋权术处理国家与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近 30 年间,她一直处于非执政的地位,似乎谈不上什么外交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共产党自幼年时代起,就已确确实实开始了自己的外交。这种外交主要的不是表现在外交实践上,而是侧重反映在外交主张上。外交的这两重含义,用近代中国外交学学者杨振先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坐而谋的问题和起而行的问题。^①此期间中共既未执政,外交方面自然主要是坐而谋。但中共又不是为谋而谋,而是谋而行为。这种行,在其执政前已有之,执政后更自不待言。因此,把中共外交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应当说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外交研究,正是基于中共在非执政期间外交的总的特点,以阐述中共外交主张为主、以叙述中共外交活动为辅的专题性研究。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外交主张,概言之,就是实行抗日外交。以此为基点,产生了中共一系列抗日外交政策,以及实践这些政策的外交活动。

抗日外交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的基本政治主张。这一主张在中共成立不久即已明确提出来。1922 年 6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号召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进行一场把中国人民从列强和军阀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一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

^① 参见杨振先:《外交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2 页。

代表大会。大会宣言用详实的记载沉痛回顾并有力地控诉了帝国主义的侵华史,指出,帝国主义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因此,大会在制定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纲领时,响亮地提出要“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①。把反帝主张纳入到政治纲领中,反映了中共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

根据反帝的基本主张,中共当时就明确地提出了具体的斗争目标,这就是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等,实际上就是要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是鸦片战争后列强套在中华民族颈项上的沉重枷锁,它残酷而又“合法”地扼杀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使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竟然蒙受着“华人如狗”的奇耻大辱。所以,当风起云涌般的国民革命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展开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很快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中国共产党是这场反帝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共中央的喉舌《向导》周报曾大声疾呼:“国际间之不平等之条约不废除,各被压迫的民族无独立之可言!中国受列强逼迫欺骗所订成之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不解除,中国永无解放的希望。”^②在这疾呼呐喊声中,深受压迫的人民大众很快被引导到反帝斗争的洪流中去。

1925年5月爆发的全国反帝大浪潮——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反帝主张转变为反帝斗争实践的大规模的英勇尝试。中共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一文中,针对帝国主义的“铁血”政策,指出中国人民反抗英、日斗争之目标,应当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第328—329、339—340页。

^② 《向导》,第76期。

特权”，而不是一般的惩凶和赔偿。这场民族解放斗争，要“务使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统治不断的动摇，务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① 在中共的组织领导下，不仅上海掀起了全市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而且这一斗争浪潮迅速席卷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极大地震撼了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尤其是此间爆发的、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都属罕见的省港大罢工，居然使香港变为臭港，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五卅运动对帝国主义的巨大打击，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转变成了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是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实行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同时反对封建势力。五卅运动时隔一年后进行的北伐战争，正是这样一场以消灭封建性的北洋军阀为直接目标，而以打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为根本目的的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自然力主进行北伐战争，并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她所特有的工农群众的雄厚基础，给予这场战争以巨大的支持和推动，使之能够势如破竹般地进行。革命运动因此迅速由珠江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达到国民革命时期的最高潮。

中国共产党的反帝主张和联苏外交是紧密相关的。这是由于十月革命划分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反帝斗争自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共联苏外交思想的提出，甚至比反帝主张的提出还要早。中共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因此，在中共一大的纲领中，就已提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

^①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第195页、196页。

问题,这明显地反映了亲国际即亲苏的特点。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追随帝国主义,仇视苏俄,以种种借口破坏中苏建交,中共对此进行了揭露和批驳。1922年9月,蔡和森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撰文指出,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放弃一切在华特权,这是中国国际地位“绝处逢生”,但北洋政府“完全以日本政府之对俄政策为政策,不以中国本身之利益为标准,而以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利益为标准。最近政变(指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亲英美的直系掌权——引者),亲日派下台,而亲美的外交系继之,故对俄政策又完全仰美帝国主义的鼻息为转移……”^①。《向导》明确提出联合苏联的口号,要求立即承认苏联,与苏联缔结经济同盟和军事同盟。1923年9月,苏联政府派代表来华同北洋政府进行建交谈判。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工作,力促建交成功。1924年5月,《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标志中苏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中共在欢迎庆祝的同时,以此为契机,掀起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号召全国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驱逐任何帝国主义于中国领土之外。这样,中国反帝和联苏的革命斗争经中共之手便汇集到了一起。

1927年是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一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和陈独秀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顽固推行,使革命成果付诸东流。从血的惨痛教训中猛醒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高扬起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同时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更加坚定了反帝联苏的主张。1928年6—7月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颁布了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纲,其中在对外政策方面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②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

^① 蔡和森:《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向导》,第3期。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4),第170—171页。

具有国家形态的局部性政权。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中共的对外政策能够表现为国家政策。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发表了对外宣言,以阐述外交政策。宣言说,苏维埃共和国把苏联作为最好的朋友与同盟者;主张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否认一切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为了镇压中国民众运动与屠杀民众而借用的外债,无条件地收回一切帝国主义的租借地,撤退帝国主义在华军队,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工厂、矿山与交通工具等;不反对同帝国主义国家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条件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坚决反对任何秘密外交,在全中国与世界劳苦民众的监督与拥护之下进行国际间的一切交涉;坚决反对世界大战与国内的军阀战争,主张和平。^①从宣言可以看出,它将中共的对外主张具体化了,尤其在对帝国主义政策方面,既着重指出要反帝,又不反对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其签订条约,进行经济合作,表现出一种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的科学态度和灵活的外交策略。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些外交政策,在共和国统治区域内已经部分地得到实现,如推翻帝国主义在这一区域的统治,消除了地区性的战乱等。共和国全部外交政策的实现,则有待于中共全国性政权的建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满洲事变,侵占了沈阳,进而又使东三省迅速沦入其铁蹄之下。对于这一事变,尽管人们当时还无法以精确的眼光预计其对时局发展的影响,但实际上它已经意味着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敏锐地对事变作出了反应。事变发生后数日,即9月22日,中共中央就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5),第130—131页。

决议从日本企图摆脱经济危机，蓄意发动反苏战争，干涉中国的革命运动，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等方面分析了这次事变发生的原因，提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①这一决议不啻中共抗日救国的宣言书，同时也奠定了中共抗日外交的起点。当然，中共此时的抗日主张并没有与日渐上升的中日民族矛盾相适应，即是说还没有把抗日摆到主要的位置上来，而是把抗日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列。这种认识固然与当时日本侵华尚未造成更严重的威胁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当时“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对时局缺乏更加科学的分析，没有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列强中最危险的敌人。此时中共抗日外交政策的另一面，就是武装保卫苏联。决议指出，要“广大的进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苏区与非苏区之内组织‘苏联之友’协会”。^②这样，就与以往反帝联苏的主张有所背离，不是为着反帝去联苏，而是为着保卫苏联去抗日，抗日外交的重心发生偏移。外交学家向来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应为内政服务。就抗日而言，抗日应为民族自身解放服务；如果离开这一主要目的，抗日就会失去群众基础，抗日外交也就失去其主要意义。

中共在抗日外交政策中这种错误，反映她还没有把独立自主确定为其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因而将自己放在从属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位置上。尽管如此，中共抗日的立场是坚定的。她不仅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号召抗日救国，而且很快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宣布对日作战，表示要“领导全中国工农

^{①②}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5），第121、122页。

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①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宣言，表示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列。

日本侵占东三省后，没有遭到蒋介石政府的抵抗，并从蒋介石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中窥视到蒋是把中共看成比日本更危险的敌人。这使日本侵略者灭华野心急剧膨胀，采取了一系列更加严重的侵略步骤。1932年1月，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获取了日后向华东、华中深展其侵略势力的一个重要支点；1933年1月，日军攻占了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打通了进攻华北的通道；2月下旬，日军开始进犯热河，3月初即轻取承德，进而夺得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长城线上的军事要塞，矛头遂直向平津。面对寇深祸急的形势，国民党政府继续妥协退让，竟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日本侵略的既成事实。侵略者从来都是得寸进尺的。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情报局长天羽发表声明，狂称：“日本因其对华关系中之特殊地位”，“须出其全力以行使其使命而履行其在东亚之特殊职责”，因此日本“反对中国方面利用任何他国势力以图抗拒日本之任何举动”；外国对华援助，“纵出以技术或金融援助之名义”，也会“极大影响于日本及东亚”，故“日本必反对之”。^② 这个被称为天羽声明而实则是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自白书，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初衷暴露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一情势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数年前已客观存在着的中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5），第204页。

② 《日本外务省非正式声明》，张蓬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7—348页。

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事实，并随之调整其外交政策。这种变化的最初表现，是毛泽东在1934年4月20日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天羽声明发表的谈话。谈话指出：天羽声明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日本帝国主义明白的确定了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并且直接的提出了日本将以武力保持日本对于中国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企图就是要在日本单独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用日本帝国主义自己的力量，来直接镇压中国的革命，并且造成更巩固的后方，来进行反苏联的战争”。^① 谈话对日本侵华野心的揭露，预示中共将把抗日摆到反帝斗争中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谈话还对日本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作了分析，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企图虽然遭受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对，但是他们真实的意义，只是限于不愿意日本把中国独占，要使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来瓜分，成为‘门户开放’的公共的殖民地”。这一科学分析，为中共后利用国际间的矛盾，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奠定了策略基础。

毛泽东发表谈话的当天，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从外交政策的视角来看，中共在纲领中开始把一般的反帝转变到着重抗日上来，即明确提出了抗日外交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就是：（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组成千百万反日民众义勇军；（3）全体人民总武装；（4）通过没收日帝在华财产和卖国贼财产和开展募捐运动等办法解决抗日军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总领导机关；（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② 这一纲领由宋庆龄、何香凝等 1179 人签名公布，产生了重要影响。6 月 19

① 外交学院编：《中国外交史》，下册，1958 年编印，第 123 页。

②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国党史教学参考资料》（5），第 394—396 页。